

書因人而貴—— 院藏「黃跋本」《塵史》品析

■ 張家榮

圖籍經清代藏書家黃丕烈（1763-1825）收藏、經眼並題寫跋文者，即所謂「黃跋本」。黃丕烈訪書必鑒別、得書時翻覽、觀書且校理、傳書則抄刻，「題跋」猶如其藏書活動之實錄，書有黃跋也成了品質與價值象徵，故黃氏當時及其後藏家求之若渴，就連現今文物拍賣市場亦珍如拱璧。基於此，本文特以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典藏黃跋本為例，既分析其參考面向，也品味當中之文藝及精神內涵。

黃丕烈之於清代藏書

黃丕烈（圖1），字紹武、紹甫，別號有蕘圃、蕘夫、士禮居主人等，江蘇吳縣（今蘇州）人。黃丕烈喜歡藏書，特別是稀見難得的宋版書。嘉慶七年（1802），經過多年的努力搜求，他的宋版收藏量達到一百多部，為此特別在新居建了專室「百宋一廬」，並請好友顧純（1765-1832）、顧廣圻（1770-1839），分別題寫室名與撰賦贊頌。此後其他藏書家的相對應事蹟，則直接說明了他的「百宋」成就對日後藏風的深遠影響。¹ 如果說，王頌蔚（1848-1895）道出的是後輩的崇敬：「三百年來，凡大江南北以藏書名者，亡慮數十家，而既精且富，必以黃氏士禮居為巨擘」。² 圖書史家陳登原（1900-1975）所論，當為學界評價：「《四庫》成書以後，嘉慶中（1796-1820），政治學術，兩趨消沈。……然及時崛起，足以復汲古、絳雲之盛者，則黃丕烈之百宋一廬是已。昔人謂乾嘉以來，藏書家當以丕烈為大宗，而乾嘉間之藏書史，可謂百宋一廬之時代，允矣」。³

藏書題跋中的黃跋

當古人看到或買到自己中意的書籍時，常習慣在卷首卷末的空白處、前後扉頁或書衣寫上一段或長或短的文字，稱之「手書題跋」。書上有名人題跋，自然彌足珍貴，不僅反映在文物價值上，更重要的是學術與藝術層面上的提升。黃丕烈每得書幾乎皆題跋，「其題識所及，聞見博而鑒別詳，巍然為書林一大宗」，⁴ 黃跋內容包羅萬象，諸如版本鑒別與評價、校書梗概、藏友故實、紀錄花費與得書感想等，除有參考或史料價值，若述及流傳亦常有感人的抒情敘寫。以下試舉故宮藏本，品析黃跋內容與讀法。

黃跋讀法

書籍記載資訊，可使人得到知識；書籍亦映射舊藏者身影，常讓關係人心有悸動。於是，跋語既有藏書紀事，文字筆意也彷彿當下心情，此乃黃跋之最真實動人者。歷來研討黃跋或以之為例者，大都從後人輯錄專著取材，



圖1 清 江標輯 《黃圃先生年譜》 清光緒二十三年長沙使院刊朱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001957~001958



圖2-1 宋 王得臣撰 《塵史》 明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2357~0123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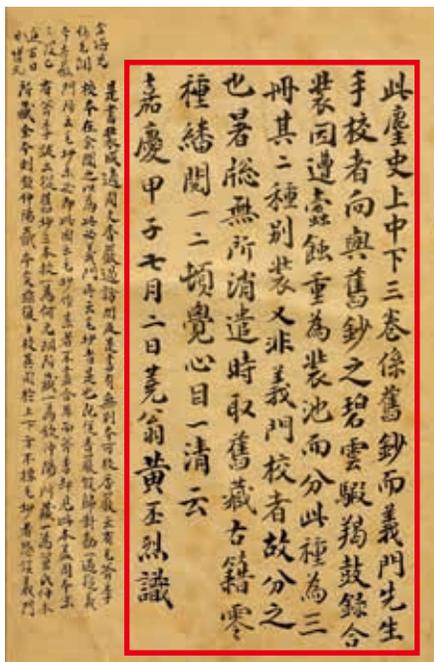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-2 宋 王得臣撰 《塵史》 明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2357~0123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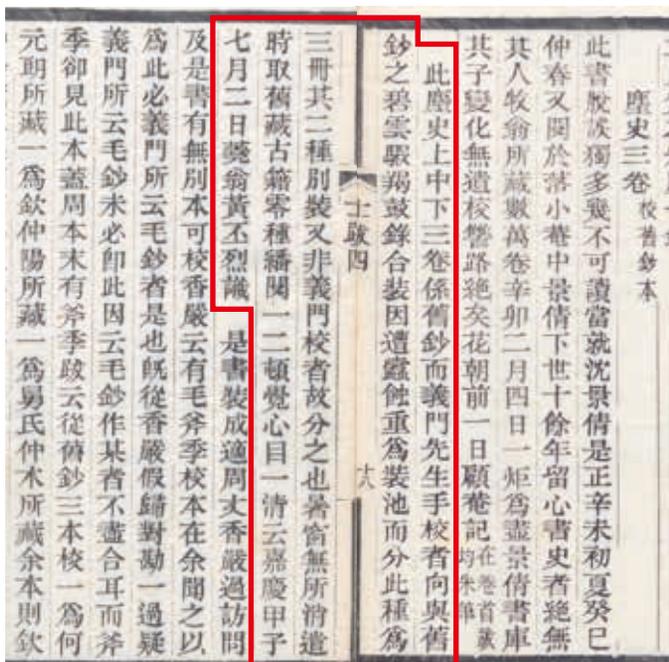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-1 清 黃丕烈撰 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 清光緒十年吳縣潘祖蔭刊滂喜齋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29848~029851

如潘祖蔭（1830-1890）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、今人屠友祥校注之標點本《蕘圃藏書題識》⁵等。這類著作都是錄自各方藏家，不僅抄經衆手，主事者編輯時也很難再覆核文字；再者，黃跋原係手寫，字跡大小楷草、用筆顏色選擇、藏印墨色濃淡、布局上下位置都可能有特殊意義，

但這些在上述作品中都無法如實呈現，若直接引用而不看原跋，總讓人有種不能完全說清楚的感覺。

緣此，以下試擇故宮藏本闡釋。明鈔本《塵史》（圖 2-1）卷下後扉頁黃跋（圖 2-2）云：「此《塵史》上中下三卷，係舊鈔。而義門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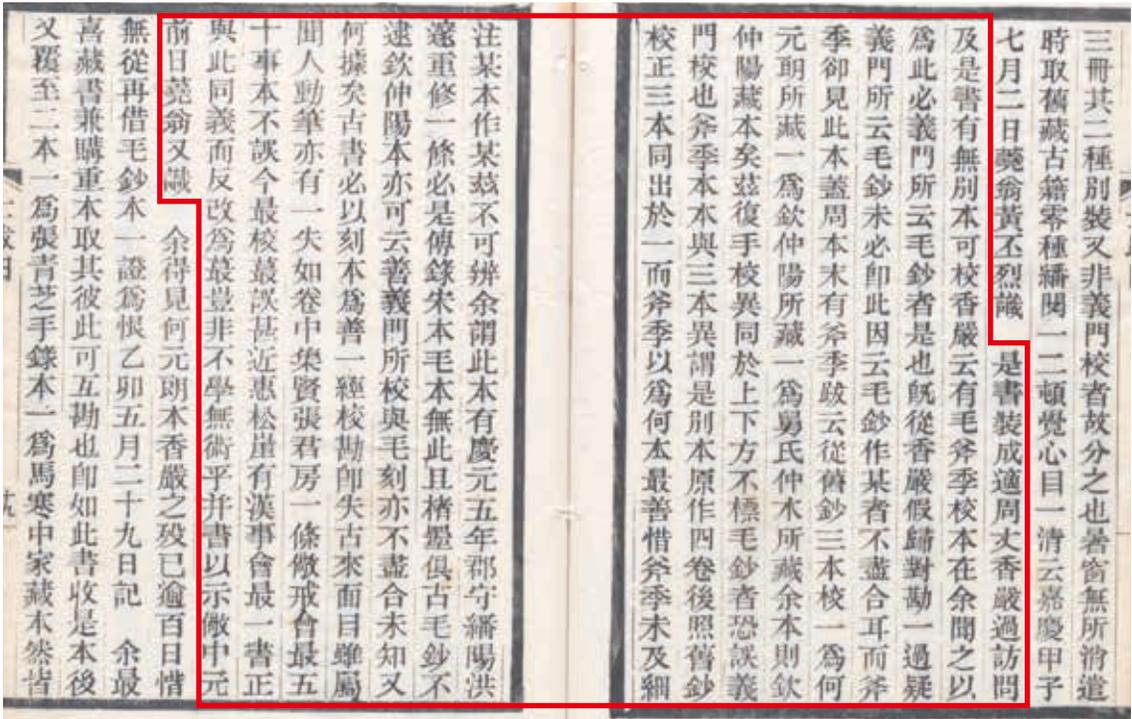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-2 清 黃丕烈撰 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 清光緒十年吳縣潘祖蔭刊滂喜齋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29848~0298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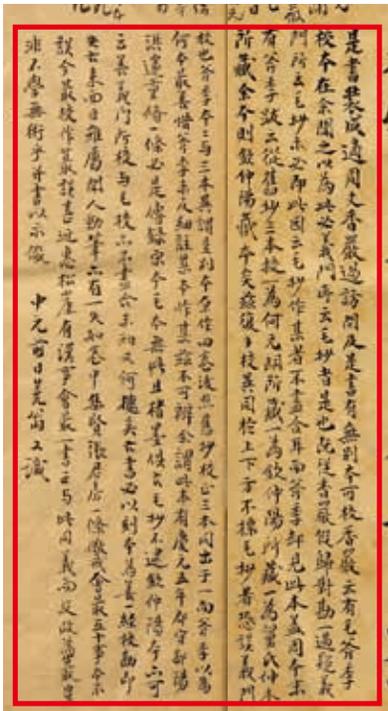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-3 宋 王得臣撰 《塵史》 明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12357~012359

生手校者，向與舊鈔之《碧雲駮》、《羯鼓錄》合裝，因遭蠹蝕，重為裝池，……暑愆無所消遣，時取舊藏古籍零種，緝閱一二，頓覺心目一清云。嘉慶甲子七月二日，重新裝訂完成後黃丕烈首跋此書，隨意翻覽並細數原裝訂及校勘者狀況。這時扉頁空間尚有餘裕，故跋文端楷字大，看來是從容之筆，自道爲了消遣，看書的閒適心情躍然紙上。若單看刻本則因無法看到此跋筆意（圖 3-1），不免感受減分！

同年七月十四日，從周錫瓚（1742-1819，號香嚴居士）借得毛辰（1640-1713，字斧季）《塵史》手校本後復校又跋（圖 2-3）云：「是書裝成，適周丈香嚴過訪。問及是書有無別本可校，香嚴云有毛斧季校本在，余聞之，以爲此必義門所云毛抄者是也。既從香嚴假歸，對勘一過，疑義門所云毛抄，未必即此，因云毛抄作某者，不盡合耳。而斧季却見此本，蓋周末有斧季跋，云從舊抄三本校，一爲何元朗所藏，一爲欽仲陽所藏，一爲舅氏仲木所藏。余本則欽仲陽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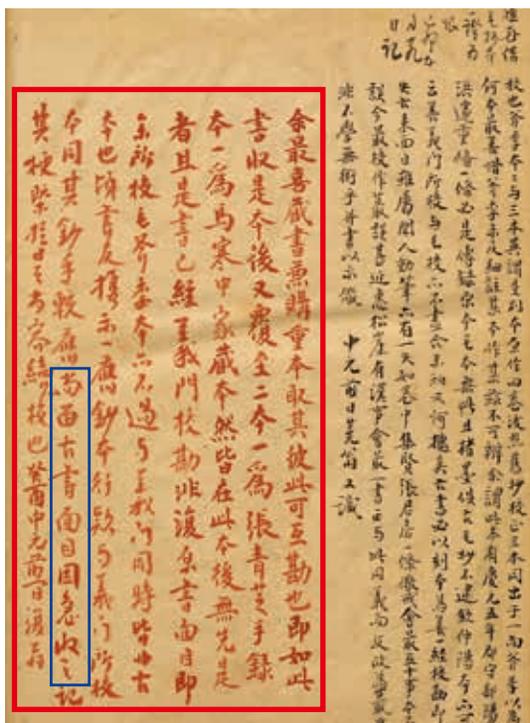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-4 宋 王得臣撰《塵史》明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平圖012357~0123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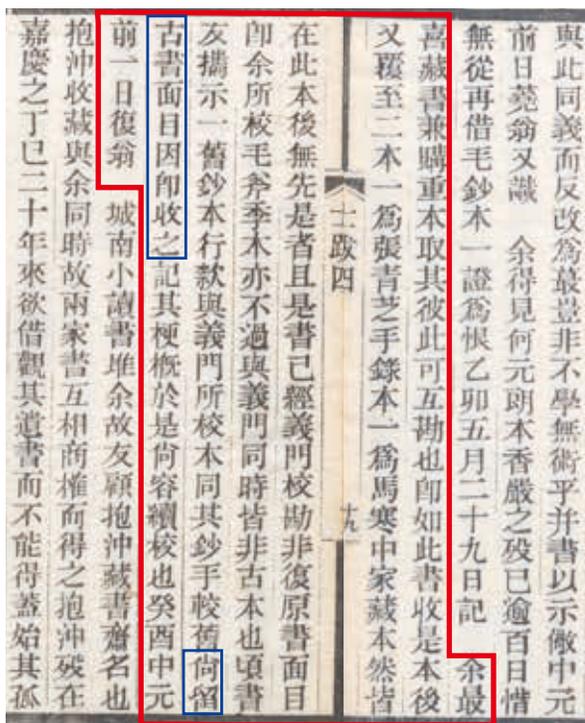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-3 清 黃丕烈撰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清光緒十年吳縣潘祖蔭
刊滂喜齋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29848~029851

本矣。茲復手校異同於上下方，……中元前日，菟翁又識。」傳統祭亡的中元節時前夕，好友過訪並相互討論，黃丕烈依舊校書不倦。或許是為了容納更多校對說明及盡快歸還借書，以致此跋雖緊接前跋，字體卻明顯偏小，且前兩行尚為楷體，第三行起至末則漸成行書。此種下筆心情，若非親筆所示，一般人從刻本中除僅知文字所述內容外，實看不出此等空間與時間的緊湊感！（圖 3-2）

九年後的嘉慶十八年（癸酉，1813），也是中元前日，黃丕烈又收到另一部舊鈔本《塵史》，在開始校對前寫下了第三則題跋（圖 2-4）云：「余最喜藏書，兼購重本，取其彼此可互勘也。……頃書友携示一舊鈔本，行款與義門所校本同，其鈔手較舊，尚留古書面目，因急收之，記其梗槩於是，尚容續校也。癸酉中元

前一日，復翁。」因此跋寫於校對前，故選用朱筆，字跡變化同前，也是前幾行楷體，後漸呈行書。一樣的節時，相同的校勘對象，依舊是先楷整後行草。跋文提到此舊鈔本「尚留古書面目，因急收之」，清楚表現出黃丕烈求古本若渴的形象。反觀刻本（圖 3-3），卻錯錄成「尚留古書面目，因即收之」，雖僅一字之誤，但其「急切」收書神情，吾人若未親眼所見，就想像不到了！

嘉慶二十四年（己卯，1819）亡友顧之達（1752-1797，字抱沖）「小讀書堆」藏書流於書市旋即售空，黃丕烈或買或借到剩餘的幾種，此在第二跋所述何元朗（即何良俊，1506-1573，字元朗）本《塵史》則剛好在其中。連忙借回去校對。第四次寫跋於本書（圖 2-5）云：
城南小讀書堆，余故友顧抱沖藏書齋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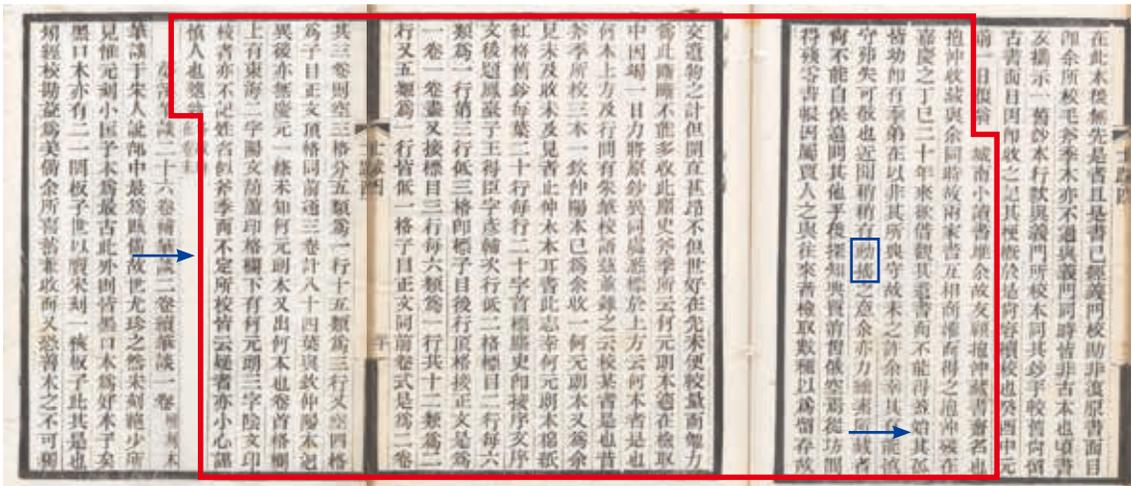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-4 清 黃丕烈撰 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 清光緒十年吳縣潘祖蔭刊滂喜齋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29848~0298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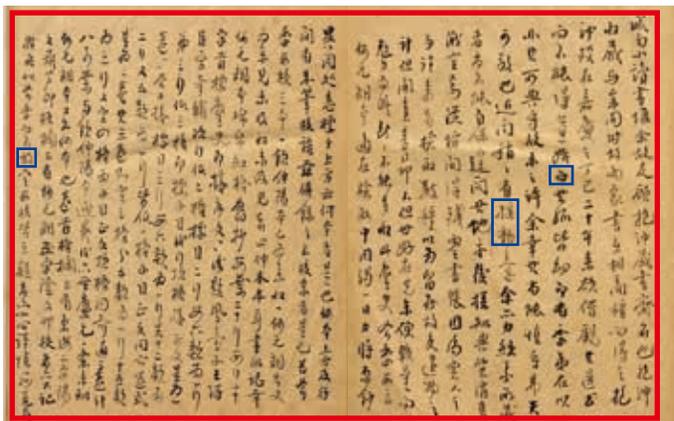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-5 宋 王得臣撰 《塵史》 明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2357~012359

也。抱沖收藏，與余同時，故兩家書互相商榷而得之。抱沖歿在嘉慶之丁巳，二十年來，欲借觀其遺書而不能得。蓋始向其孤皆幼，即有季弟在，以非其所典守，故未之許。余幸其尚能慎守弗失，可敬也。近聞稍稍有搖動之意，余亦力緘，素所藏者尚不能自保，遑問其他乎。後探知典質消售俄空焉，從坊間得殘零書帳，因屬賈人之與往來者檢取數種，以為留存故交遺物之計，……此《塵史》，斧季所云何元朗本，適在檢取中，

因竭一日力，將原鈔異同處悉標于上方，云「何本」者是也。何本上方及行間有朱筆校語，資併錄之，云「校某」者是也。

黃丕烈自述即便自顧不暇，但他還是盡力買下了幾種，憑書懷想藏友遺澤。此跋寫於竭一日力校對後，手眼必然疲憊，前兩行字跡行書後大半近草書。這字跡所表現的校者狀況，讀者於刻本未能得見。（圖3-4）更有甚者，

刻本不僅將字詞「搖動」誤錄成「動搖」，還漏掉了「向」、「敢」二字，這都可能影響後人對文意之解讀。

同年，黃丕烈經眼了顧之遶舊藏何元朗本後，又想到了多年前另一老友周錫瓚曾借校的毛斧季校本，可恨老友已作古無法再見，遂於第二跋上方記本書第五跋（圖2-6）云：「余得見何元朗本，香嚴之歿，已逾百日日，惜無從再借毛抄本一證為恨。己卯（按：嘉慶二十四年，1819）五月二十九日記。」此跋短小，全篇草書，應為寫好第四跋後的補充。然而，《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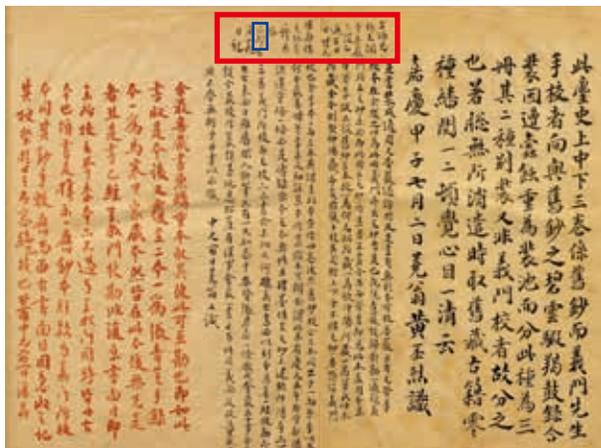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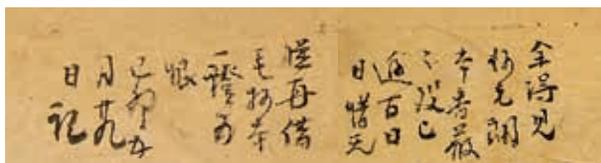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-6 宋 王得臣撰《麈史》 明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平圖012357~0123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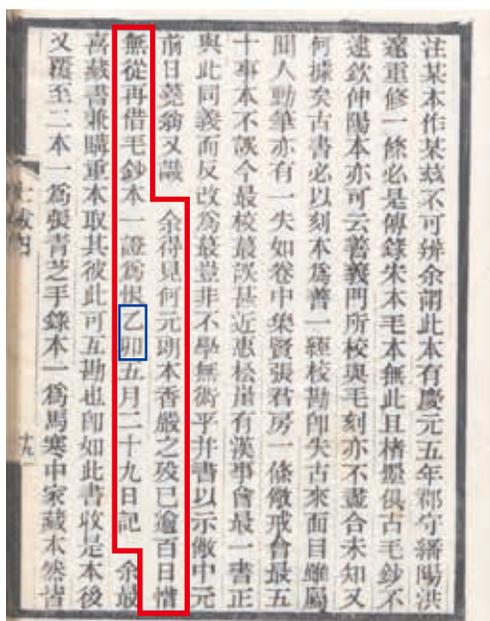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-5 清 黃丕烈撰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 清光緒十年
吳縣潘祖蔭刊滂喜齋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
029848~029851

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（圖 3-5）卻將跋後紀年「己卯」誤錄成「乙卯」，並把此跋排在第二跋後，閱讀時得特別留意。

結語

篇幅大小不同的題跋，所隱含的訊息極為豐富，從中既可見藏家個性風采，也可看到他們品評圖書、鑒別版本的方法，因此黃跋成了後世學人看重的文獻。就收藏家與典藏單位而言，

善本圖籍若有手書題跋，且是名家所寫，就不啻擁有一張保證書，此書身價也相對提高。

不論是有心想閱讀，還是想專事蒐羅黃跋的典藏館員，都得先學習如何讀懂、辨別黃跋。如前述，因後世輯錄式出版品無法呈現正確且完整的黃跋原意，是以，若想從事研究或鑒藏黃跋，盡可能看到原書跋文、正確釋錄與理清次序並予以文意解讀，應是首要課題！

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註釋：

1. 如其同時代藏書家吳騫（1733-1813，浙江海寧人）題居室曰「千元十駕」即欲以之相匹敵；清末陸心源（1838-1894，浙江歸安（今湖州）人）、民初袁克文（1889-1931，河南項城人）等的「皕宋樓」、「後百宋一廬」等樓號，則分別有宣示迎頭趕上與暗表致敬的意味。
2. （清）王頌蔚，〈藏書紀事詩序〉，收入（清）葉昌熾著，王欣夫補正，《藏書紀事詩》（與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合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 3。
3. 陳登原，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 260。
4. （清）傅增湘，〈思適齋書跋序〉，收入（清）顧廣圻著，黃明標點，《思適齋書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3-5。
5. （清）黃丕烈著，屠友祥校注，《蕘圃藏書題識》（上海：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9）。